

红色音乐家

霍长和 著



Hongse Yinyuejia

劫夫

人民出版社



红色音乐家

霍长和 著

劫夫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音乐家——劫夫/霍长和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01-004113-X

- I. 红…
- II. 霍…
- III. 劫夫-生平事迹
-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174 号

红色音乐家——劫夫
HONGSEYINYUEJIA——JIEFU

霍长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46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7-01-004113-X 定价: 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红
色
音
乐
家劫
夫

1996年12月10日晚，“李青、李丹丹、李迢迢独奏、独唱、重唱音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

这是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最显著的位置印着这样一行字：献给我们深爱的父亲劫夫及他所爱的人们。

那天前来观摩的人格外多，尤其是像我这样曾在劫夫担任院长的沈阳音乐学院学习过的人，能来的都来了，甚至连外地的也闻讯赶来了。

我随着人流涌入音乐厅。落座甫定，我便感受到了它那不同寻常的气氛。

悬挂在天幕前的设计精美的大幅音乐会会标，素雅而又庄重；摆放在舞台前的一个个大花篮，为音乐会带来了勃勃生机。

开演的铃声还没响，座无虚席的观众厅却已悄无声息。

人们在静静地等待着。

突然二楼响起雄壮健朗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歌声在音乐厅里回荡。

我的眼睛潮湿了。

二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是，劫夫没有死。

是的，劫夫没有死，那个把爱、把歌、把情献给他的祖国

和人民的作曲家没有死。

那一朵朵抛掷到舞台上的小花是献给他的。

那歌声是献给他的。

可是，法国女作家波伏瓦却说，人都是要死的。她不仅这样说，还把这句话当作她一部书的书名。

波伏瓦没错。我们的劫夫也死了。二十年前的一天，生命的门在他身后悄然关上。

他走了，却留下了他的弦律。

这弦律是他的灵魂，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灵魂。

因此，人虽走了，灵魂还在。而天荒地老，艺术家的灵魂却不会随之飘散。因此我们说，劫夫没有死。

所以，我们只有歌而没有泪。即使是1994年4月那个清冷的日子，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去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安妥他的灵魂，我们也没有泪。哀乐不属于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就是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他送行的。

也是在回龙岗，一幅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几曲千古，李氏名天下；来也清贫，去也清贫，一纸清贫，劫夫寄后人。”

这挽联写得多好啊，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劫夫有知，想必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时，开演的铃声响了，场灯随之暗了下来，二楼的歌声也停歇了。大家屏住呼吸，翘首凝视着舞台。

三姐妹一齐出场了。大厅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接着，三姐妹逐个向观众致意：我是老大李青，我是老二李丹丹，我是小三李迢迢。

掌声，掌声，掌声，她们每报出一个名字，台下就响起一片掌声。

她们被掌声淹没了。

泪水模糊了她们的眼睛，泪光在观众席里闪动。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分明看到了一对深邃的眼睛。

那眼睛的主人隐在观众席中，他安详平静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那是劫夫。

劫夫，你对这一切都满意吗？告诉我们，都满意吗？

虽说你离去已整整二十年了，但是，你看到了，人们没有忘记你。你谱的歌，他们还喜欢听，还喜欢唱。

还有，你的三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大女

儿李青，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辽宁乐团的钢琴演奏家，还是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二女儿李丹丹，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主演过《夕鹤》、《蝴蝶夫人》、《茶花女》等歌剧，1996年赴美国与夏威夷歌剧院合作，主演歌剧《图兰朵》；小女儿李迢迢，也是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的演员，主演过歌剧《风流寡妇》、《鬼雄》，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中担任过领唱。

你听，小李子（李青的小名）把那首难度极大的肖邦降b小调奏鸣曲弹奏得多好；丹丹和迢迢分别用原文演唱的罗西尼、



普契尼、威尔第、拉赫玛尼诺夫、福列的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多有素养、多么地道。

还有你谱写的那些歌，如《如今唱歌用箩装》、《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摇篮曲》、《蝶恋花·答李淑一》，她们是不是都唱得挺好？！

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音乐会结束了。

走进夜的沈阳，我的心绪久久难以平静。

劫夫那三个在艺术之树上成活的女儿的身影，还有音乐会结束时全场上下齐声高歌的动人场面，不时在我面前重现、重现，并且定格在我的大脑深处。

劫夫用他的歌曲在共和国亿万人民的心中建造了一座座矗入云天的丰碑。

劫夫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第一章

家庭身世与逃出农安

在吉林省长春市北 60 公里处，有一个古今闻名的县——农安。

农安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生息。从城郊伊通河畔左家山遗址的考古挖掘测定，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较早集居于这一带的是夫余族。东晋初，今农安县城是夫余的后期王城，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今农安城，唐代，是渤海的西部重镇扶余府；北宋时期，是辽代的军事要地黄龙府；元代，是开元路的路治所在地，城内的万金塔是元在东北地区的驿站中心。清光绪十五年，农安建县，县城和伏龙泉成为集市贸易中心，不仅附近地区，连千里之外的内蒙商队也常来此交易。

20 世纪 90 年代，农安县粮食产量突破 60 亿斤的大关，跃居全国产粮大县第一位，成为全国两千多个县（市）名副其实的产粮状元，为此，1996 年元月下旬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于是，今日的农安便有了“天下第一县”之称。

其实，农安还应为另一件事感到骄傲——这里曾养育了一位伟大的人民作曲家劫夫。

191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劫夫在县城东街的李姓人家出生，时名李云龙。

李云龙是李家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他前面，有三个姐两个哥。不知是家族的传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李家的孩子个个喜爱艺术，尤其长于丹青（就读于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大哥李云路除外。他的兴趣是写诗）。大姐李文秀善画兰草，其画风与宋末画家赵所南极为相近，她书法也拿得出手；二姐李毓秀的花卉、牡丹；三姐李□□秀的翠竹也可圈可点；就是在东北讲武堂习武的二哥李云阁，也把芦雁画得栩栩如生（二哥还会拉二胡）。

受他们的影响，李云龙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二哥买回两条鱼放在盆子里，小云龙守在盆子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看了好半天，而后，顺手抓起一张纸，在上面像模像样地画起来。三岁时，他撒尿和泥，捏成小猫、小狗、小人，摆满窗台。有时候，哥哥摆弄乐器，他就站在旁边看，等哥哥走了，他就凑过去，小心地在上弄出些响动。

长到稍大一点，家门口来了拉胡琴卖唱的或是打莲花落讨饭的，他总是跑出去看，并且跟着走出去好远好远。

就这样，他的“本事”渐渐大起来，“在家乡每逢年节有一种唱唱本的习惯，乡里的老大娘们常常要我去坐在炕上给她们整天唱唱本。唱唱本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曲调，但怎样处理长短句，都得自己去临时编造，由于那些听众都是文盲，我当然也还得尽量把语言交待清楚，特别是那些比较难懂的和关键性的语言，也还得尽量把曲调唱得好听一些，以满足她们起码的审美要求。”^①

这就是李云龙的童年生活，它美丽温馨得像篇童话。

^① 《劫夫歌曲选·前言》。

然而，这仅是他全部童年生活的一个侧面。生活的另一面却既不温馨也不美丽。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农安县里来了个闯关东的小木匠。他肩背褡裢在县城的土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个大车店，见店主正在修轱辘，就停下脚步。埋头干活的店主，无意间抬头看见了这个外乡人，不过，他并没有往心里去。等到他再抬头，看到那人还站在那里，就开口问了句：“小伙计，你有事？”“不，没，没事？”小伙子嘴说没事，可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又过了一阵儿，小伙子不但没走，反而凑了上来，他说：“大伯，你这活干得不对，应该这样……”说着，他掏出家什，动手干了起来。

店主看小伙子聪明能干，就把他留了下来。日后，把女儿也嫁给了他。

他就是李云龙的祖辈，至于这是哪朝哪代的事情，已经无从查考，只知道他的老家在河北丰润。

祖辈为李家的后人留下了好大一笔产业，李云龙出生时，家里有房二十几间，整整占了半条街。按说，仅凭房租，李家不说吃香喝辣，衣食无忧总不成问题。

可是，李家偏偏摊上了一个不会当家理财的掌门人。

李云龙的父亲叫李瑞春，这个整天笑呵呵的胖老头，不喜欢管家，却热衷于养票友，办戏院。由于他既不会经营，也不善管理，再加上没有防人之心，所以，屡屡上当受骗。可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因此有所长进。过不多久，伤疤没好，他似乎就已忘了疼，又把这种只是“角色”不同，而结局几乎完全一样的“戏”重演一遍。

此外，李瑞春还是个吃喝嫖赌之徒。

这样，李家的钱就像水一样流走了。

红
色
音
乐
家

劫
夫

李云龙正是在李家这种生活景况下开始他的人生之路的。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劫夫在一篇写于1938年的自传里，做了这样的描述：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正是我的家庭由小康转变成贫困的时候。但是，却还是能靠着几间小市场里的房子（的租金）和向亲友求借，我入了小学。正当小学毕业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家庭因为担负了一笔丧（葬）费，所以生活也就更困难了，再来供我读书是没有可能了，我于是成了一个失学的没有人管理的街头流浪儿。这时，我最感觉到快活的事情是当我看到父亲从外边借来了钱，买来了米柴的时候。每一到年节关头，父亲因为逃避债主，每天跑到别处去躲避，家里留下的是我和姐姐们，去应付那些毫无情理的债主。所以，在那时我是没有感觉到过新年的快乐的。就是这样的过了几年生活。虽然感到处处受贫困的痛苦，但是仍旧可以过下去。到了我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债务的关系吃了官司，入了狱，家里除了生活没有办法以外，还要给父亲设法筹些打官司的钱。我于是每天随着嫂嫂（哥哥在辽宁求学）到各处去哭、去求拜，但是能够助我们的真是很少。这样足有两年，我每天都得往监狱里去走两次，给父亲去送饭。当时东北的腐败的官场和监狱里的黑暗情形，我是看得很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受到衙役的恶骂甚至于殴打。尤其困难的是，在这两年之中，我还得担负着往监狱里为父亲送鸦片烟土，因为父亲如果要是断了鸦片烟就要死在狱中的。当然这得要想出很多方法才能送进去。为了这事，我是时常给狱卒们跪拜的。”^①

这就是他童年时期十几年间的生活。

这里需要稍加补充的是，他就读的先为农安女子小学，后又转入县第一小学，入学的时间为1920年。1926年小学毕业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

之后，他曾辍学两年。1928年，他曾在县城李云林中药铺当过学徒。时间约为一年。其实，学徒只是个虚名，他真正的角色，是杂役，每天用小板车给人家拉中药匣子。

后来，二哥李云阁回到了家中。在哥哥的帮助下，他们救出了在监狱中的父亲。

二哥没有回东北讲武堂继续求学，而是谋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这样，由二哥资助，李云龙升入农安县立中学。

重新回到学校的劫夫自然是欢天喜地。可他只高兴了一个学期，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无力供他在这所学校继续读下去。无奈，他只得转到师范学校。

尽管家庭经济情况十分恶劣，他也几经折腾，可他的学习兴趣仍然很浓，“我除了喜欢美术以外，还时常爱读文学书”。

我们不知道，如果劫夫就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读下去，读完了中学读大学，他将走上一条怎样的路？

然而生活不允许假设。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个年代觅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

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不仅改变了劫夫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1931年4月，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将万宝山地区生熟荒地3500亩转租给朝鲜农民耕种。5月，郝永德未经立案擅自引朝鲜农民入境，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开沟挖渠，引伊通河水灌溉土地，毁掉土地四百余亩，并建水堰横阻伊通河，致使上游低地被淹没。7月1日，中国农民在向当局提出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愤而毁坝、填沟、驱逐朝鲜农民。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打死打伤数十人。日本政府利用种种手段激化中朝人民矛盾，在日本和朝鲜报纸上发表大量歪曲事实的文章。7月3日起，朝鲜仁川、汉城、平壤等地相继发生排华事件，中国侨民在朝鲜死一百多人，伤三百多人。

日本政府借此大造反华舆论。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万宝山事件”，它是“九·一八”事变的序曲。

尽管当时善良的中国人民也许并不知道日本人蓄意制造这起流血事件，背后包藏着日后侵占东北的祸心，但他们还是被这事件本身所震惊。于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学生运动，像一片燎原大火，迅速燃遍东北各地。

李云龙所在的学校为了声援农民，掀起了向旧政府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作为学生会委员，李云龙以极大的热情，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一活动，并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由于反动当局武装围困学校及勒令提前放假，学潮被镇压。“学校开除了学生，逮捕了教员，我们也曾受过军警的包围和毒打。”

然而，李云龙和大多数热血青年并没有被吓倒，“这一次的刺激，使每一个青年的思想都往进步方面转变”。

事过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李云龙是在9月19日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学校正在操场上举行秋季运动会。消息很快传遍操场的每一个角落，喧闹的人群突然变得死一般沉寂，李云龙和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个个脸上挂着悲愤而又失望的泪水。

在这个多事之秋，李云龙家里也发生了变故。先是家里仅有的几间房子被日本浪人强行霸占，接着，当小学教员的二哥因为与东北抗日义勇军有联系，被反动当局追捕，离家出逃。这样，李云龙一家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

他只得顶替二哥，到小学代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仅仅过了一个月，到黑龙江一带从事抗日活动的二哥随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围攻农安城。李云龙闻讯偷着跑出城，找到了哥哥。

这段历史，《农安县情》一书做了这样的记载：

1932年3月27日，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由李海青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扶余县城后，渡过松花江进军农安。3月28日，自卫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县城。驻守县城的伪骑兵一旅旅长刘毓坤死守待援。日伪报纸惊呼“农安告急”。伪新京（今长春）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扑向农安并欲攻打扶余，民众自卫军为保后路，4月2日回师江北扶余。^①

在撤退途中，自卫军被日军打散，李云龙和哥哥不敢回农安，便化装成商人，逃到长春，在二姐夫家住了下来。

关于李云龙此间的行踪，有这样一种说法：劫夫曾偷着从姐姐家跑出来，独自徒步走到苏联边境。正在他准备偷渡时，被哨卡发现。

这件事是真是伪，现在已无法查证。据了解，劫夫的家人从未听他提及此事。

同年四五月间，经二姐夫潘国臣介绍，李云龙到长春第二监狱做了两个月录事。所谓录事，就是把监狱教诲师写出的讲稿重新誊清，而后再交给教诲师审定。

李云龙到这里来，本是要谋一碗饭吃，没想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原来他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教诲师刘树屏（后改名刘作垣）竟是中共地下党“长春特支”的负责人。

据刘作垣回忆：“1929年秋天，赵尚志在长春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以后成立了长春特支（时间大约是1932年上半年）。赵尚志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后，当时满洲省委在沈阳代表省委领导我的就是赵尚志。当时除了赵尚志常到监狱同我联系外，就是从上海经常寄来一些党的书报，如：《红旗》（油印，

① 农安县史志办公室1989年编。

主要是苏区战况)，《世界周刊》、《环球旬刊》、《实话报》（这都是铅印，大部分是理论性的东西。我记得有不少是批判托派、取消派的文章）。"^①

那时的李云龙，给刘作垣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沉默寡言，要求进步，擅长美术。批评一个问题，有时颇中肯。”^②

当时的典狱长陈德正在一份证实材料中写道：“他（李云龙）在二监期间，常到教务所教诲师刘作垣那去唠扯。刘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和刘的关系是不错的。”^③

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当时刘作垣是否给李云龙讲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李云龙在同他的接触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却是确定无疑的。“在他那里，我读到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书籍，同时，他曾给我讲了很多关于革命的问题，使我了解了旧社会之所以黑暗、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侵占东北的很多问题，从此，我就知道了将来世界的趋向，我自己的出路。”（自传）

可见，刘作垣以及他的那些革命道理对于李云龙是多么新鲜，多么重要。遗憾的是，这段时光太短暂了。

李云龙又回到了农安。

1933年春，已经年满二十岁的李云龙，在二姐夫的接济下，又回到县立中学读书。

说来也巧，正是这一年，日伪将县公安局改为警务局，由日本人担任指导官，统揽警务大权，全县设五个警察署，招拢一批地痞流氓组成密探队，到处搜查“反满抗日分子”，将大批“嫌疑”犯抓到“矫正局”，严刑逼供，进行“思想矫正”。

所以，李云龙此番回农安，等于自投罗网。

原来李云龙上次同二哥一起参与围城的事，早已为人知晓，

① 沈阳音乐学院档案室藏。

② 沈阳音乐学院档案室藏。

③ 沈阳音乐学院档案室藏。

此次刚一返回，便被密探给盯上了。李云龙却浑然不知。已经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他，对于宣传抗日，鼓动学潮，比以前更自觉、更热心。

终于有一天，他察觉当局要逮捕他，才知道自己处境不妙。

恰在这时，他接到关内表哥的来信，要他去青岛。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悄悄离开了家乡。

此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甚至许多年后已经“衣锦”，他也依然没有“还乡”。

究竟为什么？是童年的苦难给他心灵的伤害创巨痛深，令他不愿回首，免得睹物伤情，还是打算等到暮年再返故土？

这个谜只得我们慢慢去猜测了。

在本章将要结束之际，我们对李云龙家人的情况作一交待：在李云龙离家的第二年，即1934年，他的父亲去世，终年六十岁左右。他的大哥李云路早年过继给大伯当儿子，大学毕业后，曾在河北安次县硝磺局做职员，1929年3月，病故，仅三十多岁。三姐嫁给一个地主子弟，因受气，婚后几年就死了。其余一哥两姐，具体卒年不详，据说，都没有活过三十岁。

采访手记：

1998年10月，我专程去吉林农安采访。

踏上生养一代音乐大师的土地，我微微有些激动。他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而这个时期，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至关重要。这里的人们将给我讲述怎样的有关劫夫故事？

接待我的是县档案局的副局长，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倒是十分热情，只是她对劫夫所知甚少。她搬出了她们收集到的有关劫夫的所有档案材料。不过薄薄的数十页，并且都是二手

材料。

见我有些失望，她说，这还是近年才收集到的。早些年，曾有人张罗为劫夫作传，那时，劫夫的同代人，包括他的叔伯亲戚还在，可考虑到劫夫“文革”中的“问题”，他们还是放弃了。而现在想起写他，知情人却都死光了，一个也不剩了。

我谢过她，回到了住处。

晚上，有一位名叫李成林的老人应约来到我的房间。长春党史研究室编辑一套党史人物丛书，他是劫夫小传的撰写者。交谈中得知，老人不是职业写作者。他退休后，在档案局帮忙，写劫夫，完全是出自对作曲家的崇拜。

老人送我几本有关农安县情的书，并表示要请我吃饭。书我收下，吃饭的事被我婉拒。临走时，老人一直说，劫夫是农安人，写劫夫，也是农安人的光彩；老远来，连顿农安人的饭也没吃上，惭愧惭愧。

数月之后，我在沈阳收到老人一封来信，他在信中称：自我离开农安后，他又询问一些人，想为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无奈年代久远，劫夫及其家族的详情已无人知晓。在信的末尾，老人赋诗一首，一方面鼓励我早成此书，同时，对“吃饭”一事仍耿耿于怀：

来时接风去饯行，方显待客一片情。
人情丑陋多慢待，深愧内疚不言中。
有为志士挥巨笔，祈愿大传尽早成。
但等杰品发行日，天缘有份聚黄龙。

这封信让我感动。老人与我只一面之交，他却默默地为我，为我的书做事；为没能助我表示愧疚。其实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源于那个他引为农安人骄傲的劫夫。